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中美關係

### 中美關係：回顧與展望



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比過去任何時期的任何雙邊關係都更為複雜。隨着全球聯繫日益緊密，兩國在多個領域的相互往來亦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密切。在避免國際衝突、維護全球秩序、推動科技進步、維繫國際環境、加深國際間相互理解等領域，中美兩國有前所未見的迫切理由需要攜手合作，以實現共同利益。

兩國領導人正努力維持良好的關係，以避免衝突並實現互惠互利，但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當下，他們在化解分歧和照顧不同利益的問題上正面臨巨大挑戰。兩國民眾就如何維護全球秩序、平衡群體與個體利益等基本議題所持的不同意見，早已為兩國領導人設下難題。雪上加霜的是，中美兩國緊密相連的經濟關係更觸及到兩國民眾的利益。同時，中國在全球各地的利益不斷增長，亦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影響。



傅高義認為中美兩國有前所未見的迫切理由需要攜手合作。（圖片由傅高義提供）

中國取得的成就為兩國帶來了新的心理和政治壓力，以致經營兩國關係更顯艱難。中國人變得過份自信，高估自身對他國的影響力，開始將在國內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施於其他國家，致令海外一些國家的反華情緒高漲，它們對中

國將如何利用不斷增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感到憂慮。另一方面，美國對來自中東、北韓和中國的軍事挑戰懷有過大戒心，面對經濟挑戰時也變得過度自我保護。同時，國內的矛盾紛爭不斷以及朝野無力達成共識來解決國內諸多難題，令美國自身陷入嚴重分化。

## 一 中美關係回顧

### (一) 1946年前中美友好的基石

相較於其他西方國家，美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已與中國打下友好基石，並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雖然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和日本都曾在中國境內取得領土，但美國從未為之。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美國立即將所獲賠款用於資助優秀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儘管西方多國的傳教士都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建立高等教育體系提供了援助，可是美國傳教士在建立一流學府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和廣州的嶺南大學。這些大學在中國培養了一批在推動經濟現代化和處理外交關係上均舉足輕重的菁英人才。北京協和醫學院獲美國善款資助建立，對推動中國現代醫療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民族主義覺醒，大批年輕的中國領袖人物響應杜威 (John Dewey) 等美國思想家的學說。

二戰期間，中美兩國結成同盟。美國派遣飛虎隊 (Flying Tigers) 援助中國，並出兵協助維持緬甸和戰時首都重慶之間的物資供應線，確保不被截斷，同時派兵到重慶與中國軍隊合作。雖然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將軍和蔣介石之間矛盾重重，不過美國軍隊始終是中國民眾的盟友。此外，美國派出俗稱「迪克西使團」 (Dixie Mission) 的美軍觀察組到延安與中共軍隊合作，而斯諾 (Edgar Snow) 等隻身前往延安的美國人，則幫助中國共產黨贏得國際認可。

### (二) 中美在國共內戰、冷戰和朝鮮戰爭期間分道揚鑣

二戰時，中國政府由蔣介石領導，美國軍方也與他合作。戰後，美國派出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將軍前往中國，試圖促成國共兩黨合作，但因雙方分歧過大，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美國支援當時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協助將國軍從四川運送到東部沿海地區。國共內戰爆發後，美國並無介入其中，但二戰期間美國與國民黨建立的親密關係，遠遠勝於與共產黨的交情。1949年毛澤東在中國大

陸掌權，由於他判斷美國政府不會支持新中國，但新中國會得到蘇聯支持，於是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二戰結束後，全球的共產主義國家和「自由世界」之間的分歧愈趨擴大。北京和華府均對朝鮮問題處理失當，導致了中美兩國交戰。在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北韓出兵入侵反共的南韓之際，並未將朝鮮半島納入其防禦圈的美國政府，敦促聯合國派兵支援南韓。當時由國民黨領導、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乃聯合國成員，而北京則在聯合國沒有席位。聯合國軍隊北上越過三八線後，中國為支援北韓而參戰。這是中美兩國軍隊有史以來唯一一次交鋒。

朝鮮戰爭阻礙了中國攻下台灣以結束國共內戰的進程。1971年北京取代了台北在聯合國所擁有的中國席位和代表權，但直到1979年，鄧小平和時任美國總統卡特 (James E. Carter) 才得以推動中美兩國發展正常化的政治關係。

### (三) 改革開放和中美的積極合作

鄧小平1979年1月的訪美之旅，開啟了兩國一段超乎尋常的友好親密時期，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中美關係隨着少數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唸書、零星中國人與美國企業合作，以及少數美國公司到華開設分支而緩慢展開，並在短時間內開花結果，惠及兩國民眾。中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探尋現代化的道路，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後十年，方才尋獲一條能改善數以億計中國人生活的發展之路。

相較於美國人，中國人從兩國關係中得益更多，但一部分美國企業亦能在中國分一杯羹。對那些受惠於能夠購買價格低廉的中國產品的美國消費者來說，美國經濟政策的調整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隨着產業從美國擴散至東亞以至其他地區，美國貿易不平衡現象逐漸加劇。

## 二 兩國問題所在

從戰略上講，中美關係自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便逐漸陷入困境。從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訪華至1990年代初，蘇聯一直是兩國共同的敵人，兩國均樂意攜手應對蘇聯可能引發的各種衝突。

每個國家的軍隊都有保衛國土的神聖責任，為此，必須全盤考慮發生各種危險的可能性，並盡其所能應對突發事件。2001年「9.11」這起災難性事件，摧毀了美國世貿中心，損壞了五角大樓，美國自此開始重視來自中東地區的恐怖威脅。「9.11」恐怖襲擊對美國打擊之大，無疑令它更積極支持全球各地的軍事行動。

## (一) 台獨運動引發的緊張關係

1995年，繼任蔣經國之位的台灣領導人李登輝獲美國許可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後，台獨運動蓬勃發展，中美關係亦隨之變得緊張。中國因擔心台北會進一步推動台獨運動，於是發射飛彈飛越台灣海峽以示警告。美軍將領則憂慮中國可能會攻打台灣，遂派遣航空母艦特遣艦隊至台灣附近海域。美國一直以來所持的立場是，台灣地位在國際法上未有定論。美國雖不反對和平統一台灣，但始終反對以武力解決關於台灣地位的紛爭。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提出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發展民營經濟，而非軍事建設。然而，鑒於美國在1996年派遣兩個航空母艦特遣艦隊至台灣海峽，中國領導人決定利用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優先加大投入發展軍事力量。在中國發展軍力之際，美國軍方亦開始聚焦探討應採取何種行動防止中國武力攻打台灣。自1996年起，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和軍力擴充，使得中美雙方在軍事方面的緊張態勢隨之加劇。

## (二) 金融危機以來摩擦加劇

由於中國取得的經濟成果，中國人的自信心持續增強，而到了2008年，中國人對國內金融機構的信心遠遠超過對西方金融機構的信任。至此，中國經濟已經歷了快速增長。當美國在雷曼衝擊(Lehman Shock)帶來的金融危機中苦苦掙扎之際，中國比西方國家更為平穩地渡過了此次金融危機。再者，北京於2008年舉辦了史上最盛大輝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與之媲美，中國人的自信心隨之大大提升。

2008年後，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人對國家經濟政策的自信心繼而增強，中美在經濟事務上的關係亦變得更加緊張。1980年代末，日本經濟的高速騰飛損害了美國的經濟競爭力，美國為此憂心忡忡，關注日本有否遵循經濟競爭的公平原則。2008年後中國經濟持續繁榮，亦令美國愈發關注中國有否遵循公平競爭的國際法規。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升，業務遍布全球，加上中美貿易差額不斷擴大，加深了美國對中國違反公平競爭的憂慮。美國對中國的諸多問題變得更加敏感，包括剽竊知識產權、中國政府以各種政策刁難外資公司，以及利用國有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

中國的高層官員有權做出各種決策，但美國領導人要做出重大決策必須獲得政治支持。自1971年起，美國國內支持中美合作的兩大群體分別為企業和知識份子(特別是美國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但到了2015年，這兩個群體對中美關係的疑慮達到了1971年以來的頂點。中國國內對西方思想的壓制、中西學者無法在中國共同參與研究，以及嚴格的資訊控制，均引起美國知識份子發出自1971年以來對中國最猛烈的批評。西方企業更加關注中國國內市

場的公平問題，對中國的微詞亦遠超過去。現時大部分在華的美國企業都認為中國不歡迎外國企業。

### (三) 兩國領導人面對的考驗

2017年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就任總統以後，美國國內問題變得更難解決。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美國社會中多種勢力的角力。此前的幾十年間，美國領導人為提升少數族裔和女性地位所作的多番努力，令勞工階層的白人男性感到遭受政策上的不平等對待，從而產生抵觸情緒。他們苦於工業生產轉移至海外，以及不滿政府為少數族裔和女性提供新機會所作的努力，於是支持不受華府官僚或美國知識份子青睞的特朗普。美國人的觀點趨向兩極化，令解決國內一系列問題變得困難重重，包括重建破落的基礎設施、縮小日益擴大的國民收入差距、為青少年提供高素質教育，以及削減政府開支從而降低赤字。上述的種種難題，更令美國難以獲得必要的公眾支持來繼續領導國際機構。

儘管中國領導人現在信心十足，但他們在未來幾年將同樣面對一系列棘手問題。比如，中國經濟增速將會放緩。雖然中國成功利用經濟影響力贏得其他國家的合作，可是它缺乏軟實力，而其他國家的反華行動亦不斷升級。中國致力利用在國內行之有效的政治宣傳，引發了全球廣泛的反感。同樣，中國政府對待國內異見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方式也導致反華情緒高漲。在北京工作的外國記者曾報導，他們在中國期間被跟蹤和騷擾恐嚇、採訪受阻，他們的採訪對象有時亦會被騷擾恐嚇和粗暴對待。這令報導中國的記者對中國萌生了一種非常負面的印象，並透過他們的文章傳播。這些文章對塑造外國對中國態度的影響之深，遠大於那些旨在為中國營造正面形象的中國電視和新聞媒體。

其他國家的民眾對中國人的過度自信也非常反感。目前中國對國內異見消音所作的努力成效卓著，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歷史上，壓制異見的工作亦曾備受壓力，一如1957和1978年後的情形。一些不了解中國的美國人現正提出美國應專注於與中國進行競爭，他們低估了中國國內意見差異之大和兩國合作的機遇。

簡而言之，意識到中美合作有可取之處的兩國民眾和承認共同合作至關重要的兩國領導人，正面臨非常艱鉅的考驗。中國的過度自信和美國的自我保护令一些基本問題變得更加嚴峻，這需要中美領導人的緊密合作方能有所緩解。

鍾玉玲 譯